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五

吴光主编

中华道学与道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五

吴光主编

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集

中华道学与道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道学与道教 / 吴光主编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ISBN 7—5325—3869—9

I. 中... II. 吴... III. 道教 - 研究 - 中国 IV. 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931 号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

中华道学与道教

吴光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4 字数 272,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25—3869—9

B · 468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64063949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第五辑)编委会名单

特邀顾问:杜维明 万 斌

名誉主编:龚鹏程

主编:吴 光

编委会委员:吴 光 赵昌平 戚国雄 林安梧
陈 来 姜广辉 宋智明 罗义俊
杨国荣 陈卫平 罗 颀 徐 斌
陈剩勇 朱晓鹏 孔令宏 汪俊昌
滕 复 钱 明 陈永革

责任编辑:罗 颀

主办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至五辑书目

- 第一辑 中华人文精神新论(已出)**
- 第二辑 阳明学研究(已出)**
- 第三辑 中华佛学精神(已出)**
- 第四辑 当代新儒学探索(已出)**
- 第五辑 中华道学与道教(已出)**

开创“道学”研究的新阶段

——《中华道学与道教》导言

吴光

现在，历史的时钟引领人类进入了21世纪，但人们总是要顾后瞻前，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以求更好更自信地面对现实、开创未来。思想史的研究也同样如此。

我们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中华道学与道教》，是撰编于新世纪之初的一部“道学”研究专论，列为《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

在这里，首先有必要为“道学”正名。

在先秦诸子书中，多有“道”、“道术”之类名称。诸子百家都讲“道”，但其涵义各不同。而对“道”讲得最多、最玄的应属老庄一派道家，那时，可谓有“道家”、“道学”之实而未立其名。“道家”一词，最早见于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载《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云云，指的是以老子为宗师的战国至秦汉的道家学派，主要是指

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而“道学”之名，则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其所著录的子书主要是《老子》、《文子》、《鹖冠子》、《列子》、《庄子》、《抱朴子》等道家理论著作。《隋书·经籍志三》论“道学”之言云：

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然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

可见，《经籍志》所讲的“道学”，本意是指道家之学，而非儒家之学。但自宋儒程颐称赞其兄程颢之学为“道学”并自称“予兄弟倡明道学”及编成于元代的《宋史》又在《儒林传》外另立“道学传”以来，后儒多将北宋以后的主流派“儒学”称之为“道学”。于是，产生了许多混淆。而近儒冯友兰又在《中国哲学史》(下册，1934年初版)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1991年初版)中设立专章、专节论述“道学”，把宋、元、明、清时的理学与心学概称为“道学”，⁽¹⁾这就更强化了“道学”与“儒学”概念的混淆。“道学”一词似乎成了儒学的专名词了。当今学者在使用“道学”一词时，除了少数有心之士外，大多不太讲究儒、道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而或指宋明理学，又或指道家、道教之学。

应当承认，在以往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实践中，以“道学”概念代替“理学”、“心学”或“儒学”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的困惑，它使人们既混淆了儒学内部的区分，又混淆了儒家与道家、道教的区别。对此，前人早就提出了质疑与批评。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兼史学家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

文中就认为《宋史》在“儒林”之外另立“道学”一门是“元人之陋”，而主张编纂《明史》者省去“道学一门”，也不必另立“理学传”，而是“一切总归儒林”。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尤其是研治道家、道教的学者主张恢复“道学”一词的本来涵义，即主张以“道学”来概括道家、道教之学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著名的道教研究者胡孚琛先生。他在与吕锡琛合著的《道学通论》一书首章，就是“为道学正名”。文中指出：“‘道学’应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形成的学术系统，其中包括道家、道教、仙学三个大的分支；老子为道学之宗。”⁽²⁾我基本上同意胡、吕的“道学”定义，但对书中“唯道学独尊”的倾向，如所谓“道学之道……其精华可以究天人物理，其尘垢秕糠犹可以陶铸尧舜”⁽³⁾之类扬道贬儒的说法则不敢苟同。

但无论过去对“道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多么混淆，在学术日益昌明的时代，当人们对宋明以来的儒学研究日益深化，且对理、气、心、性之学的区分愈益明白，有关现代和当代新儒学的概念也日益清晰的时候，该是还“道学”以本义、使其回归到“道者之学”或“道家之学”意义的时候了！有感乎此，本书所谓“道学”的确定意义，即指与“儒学”、“佛学”相对应的“道家之学”，它是一个由数千年道家与道教文化传统积淀起来的独具特色且有强大文化生命力的学术系统，它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以老子“道”论为基础的道家各派的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曾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当今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转化更新，从而必将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走向施加其独特的影响。

那么，“道学”与“道教”有无异同、异同何在呢？尽管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非一篇短论所能涵括，但也有必要从基本层面加以厘清。我认为，“道学”与“道教”之“同”，最基本的一点在于

两者都以《老子》的“道”论作为其理论指南或信仰基础，都尊崇“清净自然”、“无为自化”的思想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既是道家之学，又包括了“道教”之学。但“道学”与“道教”两者又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而是有所区别的。两者之最基本的“异”，在于“道学”是指道家各学派及道教各流派的学说与义理，“道教”则主要是指以道为教的宗教的教义、教派、教规和科仪。有见于此，我们特将本书定名为《中华道学与道教》，以便学者察其特色，析其异同。

但名称毕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其内容。关于道家之学，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虽然时起时伏，但却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及其古佚书以来的三十年中，学界对道学的研究可谓前赴后继，高潮迭起；九十年代《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古本出土后，研究者更是继往开来，条分缕析；相关的研究成果、专论专著堪称丰硕，以简、帛《老子》及道家、道学为主题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也先后在湖南长沙、湖北荆门、河南鹿邑、北京、台北、韩国、日本甚至欧美国家举办了多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宗教政策的宽松及学术研究自由度的扩展，中国大陆许多地方恢复了道教的宫观遗址，整理出版了大量道教典籍以及专刊、文集，道教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交流、参访活动也日益频密，在道教文化发祥地或兴盛地（如四川、广东、江西、安徽、陕西、山东）也举办了不少以道教流派、人物、经典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因而有力推动了大陆地区道教的学术研究与宗教交流活动。在台湾、香港地区，道教的香火本就兴盛，近二十年来则更伴随着大陆开放与海峡两岸交流的频繁而大大扩展其影响。而在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以及法国、德国、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裔较多的西方国家，对于道学、道教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亦日益增强。总之，近二十年来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道学与道教的研究与交流，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开始形成一股堪称“道学”热的文化思潮。在推动这股文化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宗教团体（如中国道教协会、北京白云观、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台湾中华道教学院）、科研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宗教所、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安徽大学道家文化研究所、河南鹿邑老子研究会）、学术媒体（如中国道协主办的《中国道教》、陈鼓应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及专家学者（如任继愈、陈鼓应、卿希泰、龚鹏程、董光璧、胡孚琛、陈耀庭、许抗生、孙以楷、熊铁基及澳大利亚柳存仁、日本蜂屋邦夫、韩国李康洙等）的贡献尤为卓著，还有许多中青年学者也已经或正在成为道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特在《中华文化研究集刊》这块小小的学术阵地组织这个专辑，以便汇聚一批道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收入这个专辑的论文作者，除了有二、三位资深道家、道教研究者之外，大多数是中青年骨干学者及道学界的后起之秀。他们的论文都是其所研究领域里的精心力作，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现阶段海峡两岸道学界对于道家与道教研究的理论水平。

然而，当此“道学”文化热端倪初现之际，应当怎样继往开来以开创道学研究的新阶段呢？这是值得每个关注道学发展前景的学者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

首先是新道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正以快速稳健的步伐实现现代化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以大国形象崛起于世界东方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面前，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个大转化、大更新以适应新时代需

要、推动新时代发展的形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形势逼迫下,作为中国传统之一的儒学其实早就开始“变化日新”、“援西学入儒”,创立了力求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新儒学”或“当代新儒学”(如所谓“新心学”、“新理学”、“新仁学”之类);作为中国传统之二的佛学也早已开始从寻找“西方极乐世界”转化为建设“人间净土”,创立了“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的现代新佛学。而作为中国传统之三的道学的理论转化与创新工作则似乎起步较慢,直到上世纪末,才有人受到现代新儒学思潮汹涌的启发而大声疾呼地提出“呼唤新道家”、“创立新道学”的问题。⁽⁴⁾然而真正严密论证系统阐述当代新道学的思想宗旨、理论特色、内在结构及其现代价值、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论著几近于无,即便是有专论新道家、新道学的著作问世,也还不够严密系统。因此,道学界一项急迫的任务,就是集思广益地从事新道学的理论创新与系统建构工作。

其次是培养道学人才问题。我们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共存并进的时代。道学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家,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景。因此,抱持多元开放的心态从事道学的理论研究、思想创新与文化弘扬,培养既能把握道学真谛又能汲取诸家精华的众多人才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明白,现代开放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是惟我独尊的教父,而是沟通百家的才士;不是勇于对抗别家的旗手,而是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学子。

其三是整理资料、编印《新道藏》问题。数千年来,道学论著汗牛充栋,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如明代编刊的正、续《道藏》,清代的《道藏辑要》,近代的《藏外道书》,近人编印的《道藏提要》、《中华道教大辞典》、《道家丛书》等,对保存道学文化遗产贡献至巨。但我认为,应当尽快编印一部《中华新道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凡研究道家、道教的专著全部

编入,附以内容提要和著者简介,分类分卷出版。这不仅对保存思想史资料意义重大,而且是研究、创建新道学的理论体系所必需。

如果从培养道学人才、整理道学资料、创建新道学理论这三大方面都能开创新局面、作出大贡献,则所谓“开创道学研究新阶段”就不只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标志文化繁荣的客观现实了。

注释:

- (1) 参见《冯友兰全集》第三卷《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至十五章,第十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四十九章“通论道学”至第五十九章“后期道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 (2) 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第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
- (3) 同上,第8页。
- (4) “当代新道家”之说,最早应是董光璧提出的,见氏文《当代新道家兴起的时代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2期)、氏著《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1998年10月,董氏又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题为《呼唤当代新道家》的书面发言。“当代新道学”之说,则请参见胡孚琛、吕锡琛的《道学通论·跋》,又见胡孚琛文:《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目 录

- 开创“道学”研究的新阶段
——《中华道学与道教》导言 吴光(1)
- 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胡孚琛(1)
道教的性质 龚鹏程(28)
论道教神学 陈耀庭(48)
- 《序卦》相反相因的道家思维方式 陈鼓应(64)
“道”：子学思潮的首席概念 周山(68)
道是虚无恬淡之心契入天地万物的那片无何有之乡
..... 那薇(87)
论道家“因性而教”的道德教育思想 吕锡琛(109)
权威的消解与民主的构建
——论老子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批判思想 朱晓鹏(125)
- 三读郭店竹简《老子》 许抗生(143)
释读简、帛《老子》假借字之三法 尹振环(153)
关尹与《太一生水》 孙以楷(160)
- 再论道家黄老之学的源流、特点与历史作用 吴光(165)
“黄帝”与“老子”联系的哲学探究 郭梨华(186)
分类与太和
——《淮南子·览冥训》解读 陈静(208)

- 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医疗观 郑志明(218)
道家生死智慧探微
——对《庄子》之生死哲学的诠释 郑晓江(243)
《道教义枢》及其对“道”的论述 李刚(255)
忠孝神仙论
——兼及净明道的思想特征 李远国(279)
- 论王阳明的“道学”精神 钱明(301)
道教的文字哲学 孔令宏(327)
道教宇宙生成论与大爆炸宇宙论的比较研究 宫哲兵(350)
戏剧与道教 徐宏图(362)

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胡孚琛

【内容提要】本文在比较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基础上论证了道学文化在21世纪文化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取中外文明之精华对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形成新道家学派，从而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的历史使命。本文全面揭示出道学的精要，阐述了新道学的文化观、社会观、伦理观和个体生命观，指出道是人类知识之根，学术之本，它是宗教的终极信仰，哲学的智慧之源，科学的原始公设，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世界文明的坚实支点，人类精神回归的家园。

作者胡孚琛，1945年12月生于河北省吴桥县。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暨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事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研究和教学。著有《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道藏与佛藏》、《道教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等专著多部，并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了大型工具书《中华道教大辞典》。

当全世界的人们共同迈进 21 世纪之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回顾世界发展的历史、展望人类的未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残酷战争及野蛮屠杀民众的罪行,乃至各国流行的贪污腐败、毒品泛滥、恐怖犯罪、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等丑恶现象。至今,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核弹、生化武器等军备竞赛有难以扼止之势;仍然有所谓“第三世界”的贫困、艾滋病、疯牛病等灾病流行和人口恶性膨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极大地削弱了人的个体生存能力和独立的人性,将个体的人禁锢到群体的机械化程序之中,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诗情画意;国际间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理念使人类普遍缺乏安全感;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一百年前人们以为可以无偿享用,取之不尽的诸如空气、水、阳光等等,今天也出现了诸如大气臭氧层破坏、珍稀生物灭绝、空气污染、资源匮乏、气候异常等现象,这些决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力量所能挽救,而是 21 世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 21 世纪的世界已日益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世界社会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前,虽然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交通、信息日益发达,一种新的世界社会形态开始形成。⁽¹⁾ 地球变“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近”了,国家和地方、民族相互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任

何专制君主和政党再也无法闭关锁国,谁也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地区的矛盾热点变成国际大家庭中人人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开始注意研究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中国先哲古老的“世界大同”之梦正在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样,当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等危及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时,不能不在文化的层次上寻求一种共同的智慧。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这是马克斯·韦伯等杰出思想家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的历史规律,他甚至断言加尔文派的新教伦理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²⁾什么是文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虽是自然的产物,但文化却是人类创造的一种与自然相对的非自然体系,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的一切活动的产品。文化发展的动因来源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乃是人类心灵智慧之光的外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本身就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本身的范围不易界定,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人们习惯上至少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社会伦理(包括民俗)作为基本的文化要素,它们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这五大要素中,科学和哲学是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性思维的花朵;伦理学是人类对善的追求,是人为提升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素质所必需的道德约束和生活规范;文学艺术则是人类对美的追求,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悟和超越;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是人类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是超越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体验,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因而是文化的最高层次。由此看来,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文化的因素,并从宗教中找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点,是有道理的。21世纪人类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世界难题,根源都可归结为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引发的恶果。